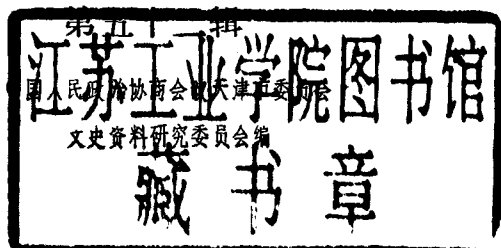


22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十月

主 编
游德昌 方兆麟
执行编辑
张玉芳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60×1168毫米 32开本 6.26印张 138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201-00574-X/K·84

定价:2.50元

目 录

回忆于学忠将军	牟中珩(1)
王树常的一生	陈志新(37)
黎元洪与天津	徐世敏(49)
我当黎元洪警卫时的见闻	李宝荣(59)
黎元洪晚年居津生活琐记	孙启康(63)
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	雷梦辰(66)
贩书随记	王振永(78)
周叔弢藏书题识	李国庆撰(91)
解放初期的天津信托公司	王明吾 申龙章(98)
完成历史使命的天津投资公司	何孝允(109)
天津解放初期的物价波动记实	李文芳 黄健(116)
天津同和兴货栈	李含三(123)
交通货栈发展述略	丁广安(132)
美丰厚行栈兴衰记	贺荫亭(136)
达孚货栈经营之道	李凤章(142)

天津中裕贸易货栈的兴衰..... 孙汉卿(150)

天津渔民盐民风俗举要..... 张东甲 于 辉(157)

理教的起源与发展..... 王鸿逵(172)

旧天津的理门 华文楨等(184)

·以史鉴今·

天津文坛一段可贵的史料 石 坚(193)

·小资料·

周叔强施财刊经 李国庆(97)

1949年天津金融大事记 翟 璐(122)

回忆于学忠将军

牟中珩

(一)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省蓬莱县徐家集乡于家庄人，1890年11月16日（光绪十六年阴历十月八日）生于旅顺。其父于文孚，在淮军宋庆、马三元部任下级军官，母亲刘氏、宝氏，共生兄弟姐妹8人。

淮军改编为毅军后归姜桂题统率，于文孚升充营副，米振标任连长。有一次，营长职出缺，按常规应以营副升任，而姜桂题却委其亲信米振标递升，于文孚愤而辞职。1908年于学忠在毅军随营学堂步兵科入伍，他自幼聪明向学，当时与徐永昌（民国以后任山西省主席）同学，每次术科考试，于均列第一名，徐名列第二。毕业后充当班长、排长，成为职业军官。

(二)

辛亥革命时毅军将领黎天才率其第9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袁世凯，改编为第18混成旅，赵荣华升任旅长。赵自幼失怙，系于氏父母将其抚养成人，及其升任旅长后，乃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营长。

1914年米振标任热河林西镇守使时，以于父文孚旧谊关系，

调任于学忠任使署副官长，1918年8月调任第18混成旅炮兵营营长。1921年川军熊克武攻宜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战斗甚为激烈，卢、赵两部皆被川军击溃。吴佩孚急乘舰到宜昌重整战线，当视察第一线时，见只有于学忠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吴到前线，便急忙收容溃兵返回第一线，使败局转安。吴佩孚对赵荣华说：“叫于营长跟我去当团长！”赵急忙说：“于营长留在我旅吧！我这有团长缺，就叫他当团长。”于是赵将其第二团团长撤职，提升于学忠任团长。从此于学忠在吴佩孚印象中留下有胆有识的记忆，不断得到提拔。

我是1923年春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陆军第18混成旅第2团充当见习官的。我和赵旅长都是黄县人，于学忠团长是蓬莱人，该旅内小同乡甚多，闲谈时大家都称赞于学忠作战英勇。

1923年秋吴佩孚令第18混成旅长兼施、宜镇守使赵荣华派于学忠为援川支队长，率一个团配属炮兵一个连，援助川军袁祖铭、邓锡侯、杨森等打回四川。当时赵荣华骄傲蛮横，四川将领受其欺压，甚为气愤。打到重庆后，四川军官向吴佩孚控告赵荣华，吴即将赵撤职，命于学忠任第18混成旅旅长驻守宜昌、施南一带。当时该地区种植大烟，于学忠就地收取烟税，积资购买枪械，并请求改旅为师。1925年吴佩孚委于学忠任陆军第26师师长，该师辖三个旅，每旅两个团。同时，授将军府将军。

1926年吴佩孚任命于学忠为第8军军长，将第26师扩编为26、25两个师。同年春季与北伐军作战时，吴委于学忠为联军第9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辖第7师师长阎德胜部、第8师师

长陈建斌部、第18师师长毛永息部，以及原属第25、26两师等。

同年7月吴佩孚的十四省联军为北伐军击败，穷途末路中，到河南邓县于学忠部，企图带于部入川。于对吴说：“大帅带重兵入川，川军将领为保其私人地盘，决不容纳外军入川，因其恐怕喧宾夺主。大帅如决定入川，只能带领卫队团，入川后尚能得到川军将领的欢迎和保护，在大帅入川后，我亦解甲归田，与大帅共进退。”吴佩孚以于言有理，乃决定只带卫队团进川。吴入川后，果然受到川军将领的优待。

吴佩孚入川后，蒋介石即派员送来委任状。委于学忠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于学忠对送委的官员说：“他委任我？我还想委任他呢！我这脑袋瓜上今生不戴他国民党的帽花！”当场将委任状撕碎，送委的官员灰溜溜离去。东北军张作霖亦派员拉拢于学忠，而于坚决下野，脱下军衣，骑着大马回蓬莱老家去了。

于学忠下野后，其部队为冯玉祥改编，当时第25师师长马廷福、26师师长杨殿云、第7师师长刘乃昌，生怕冯玉祥将他们“吃掉”，疑虑重重，乃藉调防之机联合一起脱离冯玉祥，将部队一齐拖到安徽蒙城一带，同时派员到蓬莱于学忠家，力请总司令出来统率这三个师。于学忠说：“我们坐船要坐大船，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我出山后，为长远计要归属东北军。”

(三)

1927年夏，于学忠到北京见张作霖，张对于说：“你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咱们山东人没有孬种，我和你父亲是很

好的朋友，现在我们来一起合作，我的队伍待遇咋样，你的队伍待遇也咋样，你看好吧？”于说：“我不敢说合作，我的队伍归大帅统辖，凭大帅改编调用，我父命我代向大帅问好。”张说：“那好吧，咱们就这样办，你归张学良指挥。”张作霖给了于学忠十几万军费，于是于学忠赴蒙城就任。张作霖为什么说他于学忠之父是老朋友呢？是因为于文孚在毅军当连长时，张作霖在东北畏罪逃跑，曾在于文孚连内当过马伕。这是于学忠之父亲口对我谈的。

于学忠抵达部队后，将张氏所给的临时军费，按照三个师的总人数平均分配，官兵分的钱数一样多，其本人也不例外，官兵非常振奋。部队由蒙城开拔至蚌埠，乘火车转向河北。当时张学良驻河北省及平津一带，归还其指挥系统。当车抵徐州时，东北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山东督办张宗昌，请求于部帮助抗击冯玉祥部队由陇海路向徐州的进攻。当时冯军已攻占了徐州车站，于部亦难以通过，于学忠遂答应帮助攻打车站，只用了半天时间，即将冯军打退。战后，张宗昌曾向张作霖请求，留于学忠在山东归其指挥，由于张学良坚不同意，于部始得乘车到达邯郸。张学良对于甚为器重，称其为前辈老将。他曾对别人说：“于学忠能忠于吴佩孚，亦能忠于我，他是一员最忠勇的大将。”于学忠被任为东北军第20军军长。

1928年6月3日，东北军被北伐军打败，张作霖在退回关外行抵皇姑屯时，被日军预伏的地雷爆炸成重伤身亡后，张学良继其父统率了东北军政大权。这时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两部亦被北伐军压迫退到滦河一带，企图退往关外。张学良鉴于东北财政困难，无法容纳张、褚两部，遂派于学忠、胡毓坤两个军在山海关、秦皇岛之线阻击之，经过激烈战斗，张、褚军

溃败，各自逃亡，直鲁联军遂被消灭。

张学良以其父新丧，又失去关内地盘，决心整顿东北军，把军、师番号撤销，将东北军各师缩编为旅。任命于学忠为临绥驻军司令，原第20军的第7、25、26三个师，合并缩编为213、217两个旅，仍归于学忠指挥，驻扎于山海关、绥中一带。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在津浦、京汉铁路两侧激战胜负难分之际，蒋曾派员到东北拉拢张学良助其打冯、阎；同时冯、阎亦派员说项，请其助彼等打蒋。对此举足轻重的张学良均未及时表态。同年夏，蒋乃私下拉拢于学忠部之213旅旅长马廷福，使其背叛于学忠，将该旅拖到天津打击冯、阎后方，并给马廷福大批款项，许诺其如攻占天津，出任天津警备司令。

马廷福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即与该旅参谋长李馨、640团团长安福魁、641团团团长孟百孚、642团团团长张砚田等，几次夜中密商企图胁迫于学忠下令各旅同时出兵攻取天津、北平。但⁶42团团团长张砚田不愿背叛于学忠，乃向于告密，于对此已有预防。某日午马廷福及其团长等到临绥司令部，要求于学忠背离张学良，出兵天津、北平援助蒋介石。于坚决不从，并对马、安、孟严加斥责。于是马廷福于次日晨私率安、孟两团开出山海关，向西奔去。于学忠闻讯，当即骑马追赶。因该旅营长以下军官，都是服从于学忠的，因而马、安、孟三人不得不俯首回防。于学忠当即将马、安、孟及蒋派来策动叛变官员一同关押，送交张学良惩处。当将马、安、孟及参谋长撤职后，于学忠自兼213旅旅长，令临绥司令部参谋处长牟中珩任该旅参谋长，代为办理旅内事务。从此，张学良对于学忠更加信任和器重。

1930年9月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成功，张学良表示拥护中央，旋即令于学忠筹备出兵平津，至9月20日进抵塘沽。当张、于计议出兵平、津时，张对于说：“这次请你率兵，入关进占平津，要干得漂亮些。”于说：“不放一枪。”张学良大喜说：“好呀！”。于学忠遂派其军械处长刘浥尘到北平购买燕窝、鱼翅等礼物，赠送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是阎锡山的谋士），使阎锡山主动撤出平津，我进彼退，一枪不放。因刘浥尘与徐永昌系原毅军随营学堂同学，因而能圆满完成任务。

于学忠于闲谈时对我说：“只有我这脑袋瓜的聪明，才能与少帅接上灵气，他一开口，我就明白他的心意，我一开口，他亦能知道我的心意。这次出兵关内，派我率兵入关，他只说一句话叫我‘干漂亮点’，我就明白他的心意不打硬仗。于是我就说了个‘不放一枪’，就正合他的心意。这样大事，我们二人各说了一句话就完成了。”

东北军进关时张学良把入关部队编成两个军，于学忠任第一军军长，王树常任第二军军长，每军辖三个旅。1931年1月于学忠令我先率213旅乘火车直抵北平，到北平车站下车后，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到车站迎接，因楚系我保定军校时的队长，感情甚好。到其司令部座谈时，他问我：“你们东北军究竟进至何地为止，是否要进到张家口？”我说：“我不知道。”楚说：“你们进到何地，我们就退出何地。”

当时第一军进驻北平，第二军进驻天津。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在天津任河北省主席。蒋介石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主动与张学良结为换帖兄弟，并将青岛港让给东北军的海军驻扎，令张学良保荐青岛市市长。张遂保荐其海军司令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以便海军与市政统一领

导。

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时，在四川避居的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张学良每月给吴佩孚数千元作为生活费，于学忠亦常去吴家看望。1931年春，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番号，着213旅改为114旅，第217旅改为118旅。

(四)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瓦解，所遗残部，蒋介石令张学良予以改编。1931年2月9日石友三部队尚有6个师、骑兵1个旅、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60000余人。张学良将其改编为第十三路军，先后发给协饷30万元，后请示国民政府照准每月发给60万元。驻防河北顺德一带。

石友三自沈阳回防地，途经天津与日本军方暗中勾结。5月间，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传闻委任石友三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由邹鲁汇寄50万元。从其来往电讯中，侦知石部确有不稳之意图。7月15日石友三将张学良派任的秘书长张云责活埋，又掐断北平至顺德的电话线路，并就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

这时张学良正在患病住院治疗，于学忠奉其旨意，担任第一集团军司令，负责平汉路作战；王树常任第二集团军司令，负责津浦路作战之责。兵力有8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石友三北犯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为先锋，沈克、唐邦植及石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后，兵力约56000余人。

于学忠主动放弃石家庄，诱敌深入。当石部渡过津沱河，直犯保定、望都之线，遂展开激战，叛军溃败，拟向津浦方面后撤，又遭到第二集团军的压迫。同时顺德叛军留守部队亦被

刘峙、胡宗南部缴械。最后石友三、唐邦植仅率3000余人逃赴山东，投靠韩复榘，平叛仅用半月时间即行结束。讨伐石部虽为时甚短，影响却很重大，因东北军在“老家”的主力部队，调入关内，武器弹药赶运往关内甚多，致使东北防空空虚，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件造成便利条件。

1931年夏季蒋介石发表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张学良对于说：“蒋介石叫你当河北省主席，怎么事先没有同我商议？我不知道这件事。”于学忠说：“那么咱就不干吧。”张学良说：“他给咱了，咱为什么不干呢！”由此可见蒋介石有心直接拉拢于学忠。

同年秋，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迫使十几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地撤退关内，把大好山河，拱手让给日本。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抗日宣言，全国人民纷起响应，强烈要求抗日，掀起救国运动高潮，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为气愤。

1932年春，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全国反对‘九一八’不抵抗的风浪甚高，现在我们二人好比坐在一只小木船上，在大风大浪中就要翻船，必须下去一个人，才能保住这船不翻，你看我二人谁下去好些呢？”张学良说：“那当然是我下去了！”于是蒋介石即把不抵抗罪名，完全推到张学良身上。令张学良下野出洋，赴欧美考察，蒋介石乘机将东北军改编。在北平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令何应钦任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出国前将东北军交于学忠指挥。

1933年张学良出洋之前，寄了一封影印的亲笔信给东北军团以上军官，信内大意说，因我年轻无经验，吃了人家的亏，

在我出洋后，东北军要团结起来。张学良到美国后，先期到达美国的原参谋长杨毓珣，询问张：“你在出国前，对东北军都做过安置了吗？”张说：“安置啦！”杨又问：“你对于学忠安置了吗？”杨认为于学忠非东北军嫡系，恐怕靠不住。张学良忽然站起来说：“哎，你不要错看了于学忠，将来收拾东北军后事的人只有于学忠！”（这是杨毓珣回国后亲口对笔者说的）由此可见，张学良对于学忠极为信任。

张学良出洋之前，曾将其私用的及库存的贵重军械，分散给东北军高级将领使用。各将领争先恐后地争着要，惟于学忠不要，而张学良乃将大部分“家底”及贵重军械，都交给于学忠。

1933年蒋介石以将开始抗日为名，把东北军所有的旅，均改编为师。于学忠充当51军军长。该军辖113师、114师、118师三个师，驻扎天津、塘沽、大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于学忠同我闲谈中说：“张副司令出国后，东北军许多将领对张副司令左右的官员们都冷淡下来了，及张副司令回国来了，他们对张副司令左右的人，又亲热起来了。我与他们不同，我在张副司令出国后，对他左右的人仍然如旧地亲热，未曾冷淡过。现在张副司令回国后，我对他左右的人依然如旧，以前不冷，现在也用不着再热。”于学忠对张学良的忠诚始终如一。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继而入侵热河及长城各口，虽遇我军抵抗，但热河终于沦于日军魔掌。而蒋介石仍继续执行其“安内攘外”政策，并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同年5月蒋命黄郛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把绥

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

塘沽协定后，蒋介石派黄郛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并任委员长。黄听从日本的摆布，在“非战区”内划为冀东特别区，以汉奸殷汝耕为该区专员（殷汝耕于1936年组成冀东22县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黄郛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组织两个警察纵队，驻扎“非战区”内。

于学忠在51军中抽调干部，购买枪械，委任张庆余为冀东特警第一纵队长、张砚田为特警第二纵队长（每纵队辖两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一个团的兵力），到非战区驻扎，归殷汝耕指挥。这两个纵队后又改编为冀东保安队，1937年7月28日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军日侨甚多，并抓获殷汝耕，拟汇合第29军进行抗日，这时第29军已撤出北平，保安队在西撤途中被日军冲散，大部分官兵回到51军加入抗日行列。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军后方。利用失意政客如白坚武、郝鹏等收买汉奸、流氓，组织“便衣队”，经常由日租界出动，扰乱津市治安，当被我保安队击溃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妄想游说使于学忠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

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着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在河北省政府（现金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甚至抢夺岗哨的枪，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于学忠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其同伙，窥视于学忠活动时间，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如买通于的

厨师在饭菜里下毒药；买通于的副官欲在卧室内枪杀于学忠；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这些阴谋活动，均被于学忠预加侦知和防范，未能得逞。

1935年春季于学忠忍无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此后，日军在天津挑衅行为虽有所收敛，但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当时何应钦即在北平，向于学忠通电话：请于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不久，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协定》达成后，蒋介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所属的111师、113师、114师、1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

在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有一次在省府与我闲谈说：“都说共产党不孝顺父母，你看人家周恩来对父亲不是挺孝顺吗？”于学忠率51军到陕、甘后，1936年春在西安于对我说：“你看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没有一个好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共产党方面。当日吴大帅（指吴佩孚）如果不失败，由我们来管理国家大事，我们决不能搞得象他们这样糟糕。”

1936年冬，51军进驻甘肃，调归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朱系蒋的嫡系），朱绍良令第113师和118师在兰州以南岷县一带，令第114师到兰州以北百余里地带去截击北上抗日的红军；同时蒋介石密令于学忠派一个师堵截红军通过腊子口。因东北军各部队经过“九一八”事变后，均倾向联共抗日，于部派出的部队，在不打内战口号下，进至岷山一带后按兵不动。蒋

介石又急电命令新第14师鲁大昌部去扼守岷县天险腊子口。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调东北军进军甘、陕以达消灭异己目的的阴谋，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联合抗日的问题，深得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

1936年2月初，蒋介石召张学良到南京，对围攻陕北红军作了新的部署。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同张学良、王以哲进行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并达成口头协议。4月6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等方面联合抗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同年9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又亲笔致函于学忠，内容如下：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凤稔先生热情爱国，对抗日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①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即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要求蒋介石停止打共产党，一致抗日，并反映东北军官兵思乡心切，都想把日军赶出华北，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当时蒋对张说：“他们真想打回老家去吗？我不信，我要亲自问问他们，叫他们都来见我，我问

^①注：彭雨峰即彭雪枫，当时是中共派往山西等地做统战工作的代表。